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现代财税体制基础

高培勇

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制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围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准确把握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对于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作出的战略部署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论断。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党的十九大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事实以及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所作出的重大论断,是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选择。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制度,就是健全符合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战略选择的财税制度。

这启示我们,无论是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还是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制度,均要以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发力,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行动才能抓住要害、踩到点上,才不会走偏变样。

围绕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作出的战略部署

现代财税体制由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现代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体制、现代税收制度等一系列现代财税制度所构成。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并作出战略部署,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财税体制不仅与现代国家治理一脉相承,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部署,正是围绕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而作出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高度概括为“完整性、统一性、可靠性、公开性和年度性”。根据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原则,特别是针对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十四五”规划纲要作出了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和审查监督;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等部门。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要建立在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两个积极性特别是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以科学规范的现代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前提。根据新修订的预算法关于“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原则,同时针对现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十四五”规划纲要作出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

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等部署。

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区别于传统税收制度,现代税收制度的税制结构相对均衡,直接税和间接税各得其所,各项现代税收职能均可在相关税种的支撑下得以充分施展。从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现代税收职能的要求出发,同时针对现行税制结构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十四五”规划纲要作出了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建设智慧税务,推动税收征管现代化等部署。

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作出的战略部署

现代财税体制自身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现代财税体制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部署,正是围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作出的。

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不仅要走现代预算管理制度之路,更要叠加高质量发展要求。鉴于当前预算管理上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为对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抵御各种风险和和挑战的要求,“十四五”规划纲要作出了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建立健全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等部署。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除了要以科学规范为标准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格局之外,还要符合高质量发展

要求。鉴于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上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为对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又鉴于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不足制约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短板和弱项,“十四五”规划纲要作出了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规范转移支付项目;调整优化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推进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等部署。

税收制度改革不仅要瞄准现代税收制度持续发力,又要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将税收质量和效益作为考核税收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尺。鉴于当前税收制度上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为对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实现税收公平正义的要求,“十四五”规划纲要作出了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进扩大综合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推进房地产税法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逐步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聚焦支持稳定制造业、巩固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等部署。

总之,围绕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为现代财税体制布局谋篇,将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制度贯穿于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全过程和各方面,以更加精准务实的举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现代财税体制基础,既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更是一项非完成不可的重大历史任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漾濞槭、华盖木、绿孔雀……云南珍稀动植物数量稳定增长——

保护极小种群 抢救基因资源

本报记者 张帆 徐元锋 杨文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走遍整个山涧,都没发现新的植株!研究人员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担忧与失落——2002年,漾濞槭被发现时,仅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境内苍山西坡一个小山村附近发现残存的5株,只有两株开花结实。

为保护漾濞槭这类种群数量极少、受威胁程度极高的物种,2004年,云南提出极小种群保护。多年来,全省实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项目100多个。漾濞槭、华盖木、滇金丝猴、绿孔雀……许多极小种群物种受到优先保护。

快速行动,保护自然宝库中闪亮的珍珠

相对于草本植物,想要发现新的乔木物种并不容易。作为新物种,漾濞槭尚不在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名录之内,如何保护也是个难题。

漾濞槭并非个例。部分植物分布地域狭窄或呈间断分布,长期受到自身因素限制和外界因素干扰,出现种群退化和数量持续减少的现象,种群及个体数量极少,已低于稳定存活界限,随时濒临灭绝。

“一方面漾濞槭这类植物亟待保护,另一方面又缺少相对权威的描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杨静说,由于生境退化、人为干扰,加上部分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如果没有人类的主动保护,部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可能会走向自然消亡。

不仅是植物,不少动物种群同样不容乐观。历史上,亚洲象曾在我国近半国土上栖息、繁衍,到20世纪80年代,就仅存于云南边境地区,种群

数量下降到150余头;绿孔雀的栖息地也不断丧失,野外种群数量一度下降到不足500只。

小物种同样是自然宝库中闪亮的珍珠,也是人类宝贵的资源,保护行动必须立即开展。2005年,云南省启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优先保护行动;2010年,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规划纲要及紧急行动计划得到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复;2012年3月,原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2015年)》,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作推向全国。

今年4月13日,云南省林草局发布《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2021版)》(征求意见稿),根据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生存和保护现状,对2010年提出的第一批62个物种进行了调整和更新,101种野生植物拟进入新名录,更多极小种群植物,有望得到优先保护。

就地保护,帮助种群野外恢复

清晨6点,第一缕阳光洒落无量山,猿群的啼声在山中响起。由此判断猿群位置后,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区东管理局大寨子西黑冠长臂猿监测站的熊有富立即奔了过去。猿走人行,猿留人停,熊有富每隔几分钟就记录一次西黑冠长臂猿的活动。

这样的“和谐”来之不易。“西黑冠长臂猿胆子小,刚开始,我一靠近,它们就跑,只能距离20多米观测几秒钟;现在它们基本适应了我的存在。”2011年,熟悉地形、野外经验丰富的熊有富协助科研人员,仅用6个月就完成了对目标长臂猿的习惯化,自此开始对长臂猿的守护。

保护西黑冠长臂猿,靠人也要靠

机制。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境内的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区,设置了相关管理机构,从专业角度给予保障;保护区外的集体林区划为公益林管理,让分布在保护区和国有林区外的长臂猿栖息地也能得到保护。经过多年保护,目前中国西黑冠长臂猿已经恢复到了1300余只,全部分布在云南省境内,占全球90%以上。

在云南,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呈现稳定增长趋势;亚洲象从150多头增长到300头左右,滇金丝猴从1400只增长至3000多只。西黑冠长臂猿、黑颈鹤等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呈现稳定增长趋势。华盖木、漾濞槭、巧家五针松等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繁育人工种群10万余株,回归3000多株,迁地保护的华盖木、滇桐等已开花,部分种类能正常结实。

西畴青冈曾经只剩9株,其中8株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为了保护西畴青冈,当地划定了241亩的保护小区,每株树都有自己的保护牌,在专业人员的管护下,西畴青冈正茁壮生长。

除了西畴青冈,蒜头果、水松等极小种群植物保护小区也在富宁县建立。一方面,通过建立保护小区或保护点,最初发现的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研究人员积极开展人工扩繁,如今西畴青冈苗木超过千株,种群得到修复。在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长期物种监测发现,保山茜茜正常开花结果,却无法繁殖。为此,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保山管理局与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在保山茜茜原分区分区附近开展人工繁育,200株保山茜茜苗木回归种植在高黎贡山迁地保护基地。

迁地保护,给物种和基因留“备份”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

明植物园内,已有50多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在此安家,这也是以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为特色的专类园。曾经“命悬一线”的植物,在这里有了“备份”,有望重新焕发生机。

早在2008年,昆明植物园就尝试漾濞槭的人工繁育。2015年,人工栽培于昆明植物园的漾濞槭首次开花、结实。随着技术成熟,上万株漾濞槭苗木如今已经成为大理州漾濞县、云龙县和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等地开展生态修复的原生树木。

截至2019年底,云南已实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拯救保护项目120多个,建设30个保护小区(保护点)、18个迁地和4个迁地保护基地(园)、20个物种回归实验基地,20余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已达到拯救保护目标。

“每挽救下一个物种,我都异常兴奋,不仅是挽救了一个物种本身,也是帮助人类抢救回了一种基因资源。”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卫邦说,保护极小种群,既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需要,也是人类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如果没有雄性不育野生稻,就没有今天的杂交水稻;而不少土著鱼携带的独特抗性基因,也为未来商品鱼育种提供了更多可能。一方面,每一个物种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野生动植物保存着丰富的遗传基因多样性,蕴藏了巨大的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保护极小种群物种,也是在保护物种基因。

实际上,物种“备份”不仅在野外。截至2020年12月,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保存植物种子10601种85046份,占我国种子植物物种数的36%;植物离体培养材料2093种24100份,动物种质资源2203种60262份,微生物菌株2280种22800份,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物资源战略储备。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依托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成果,“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绿色化”推进蔬菜种植基地建设。目前,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30余万亩。图为近日,当地农民在管护蔬菜。刘浩军摄(人民视觉)

引进优质项目,加快提档升级,河北廊坊——

培育高质量发展增长点

本报记者 张腾扬

“项目落地后,发展顺利,仅用40余天时间就投产达效。目前为川藏铁路项目提供变电站的第一批订单正在紧锣密鼓生产。”日前,河北省廊坊开发区内的中电新源电气集团车间内机声隆隆,公司负责人齐健在察看生产进度。

据了解,自2019年下半年进驻廊坊开发区至今,中电新源电气集团已将廊坊开发区作为公司战略发展重心。2020年上半年,公司已基本完成内部改制,本部由中电新源北京公司正式改制为中电新源(廊坊)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并顺利实现了部分业务转移至廊坊开发区。

廊坊紧邻京津,近年来,当地借势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东风”,以园区建设为抓手,加快引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围绕建强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创新链,推动项目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聚集,促进产业集群集约集聚发展,培育高质量发展增长点。

廊坊临空经济区确定了亩均投资至少500万元、亩均年纳税至少50万元的“硬杠杠”,引进优质项目。2020年,33个项目签约落地,总投资1200亿元,涵盖航空科技创新、生命健康、航空物流、临空高端服务等领域。

在文安县,当地借势雄安新区建设,紧紧依托“雄安建设、文安服务、雄安研发、文安制造”的招商引资理念,深耕雄安新区产业链条,服务雄安新区建设需求。同时,文安县积极培育现代物流、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服务项目,为打造优实现代化雄安做好配套服务。加快“腾笼换鸟”,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廊坊市各园区做好挖掘自身潜力、加快提档升级,强化招商引资,完善奖惩机制“四篇文章”,制度倒逼与要素倒逼相结合,努力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向优化配置要发展质量,园区活力和发展空间被有效释放了出来。

目前,廊坊市各园区全面强化“亩

均论英雄”,控制土地增量与积极盘活存量同步推进。全市14个省级以上园区,在不到4%的土地上,聚集了全市80%以上的新项目、90%以上的新兴产业和80%的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了全市70%的财政收入和80%的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成为廊坊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此外,廊坊市制定出台了《全面加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办法》,明确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建立起联席会议、企业走访等“6+1”制度机制。32名市级领导、237名县级领导分包服务民营企业,带头当好企业“第一服务员”,在全市1068家重点民营企业中实施个性化“管家”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在融资、用地、用工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我们将扎实推进开发区新一轮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实现开发区大发展、快发展。”廊坊市委书记杨晓和表示,廊坊市将通过推动园区“二次创业”,迈好“十四五”开局第一步。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管、主办 权威性、学术性、理论性、知识性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必备期刊,欢迎订阅 2021年第1期(总第265期)要目 学会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 孙业礼 新时代视域下的方志敏精神再论 周萌 “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一)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定位与建设的若干思考 杨凤城 无妨以更广阔的胸怀来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 ——兼论学术观念的自我反思意识 吴志军 明确归属和淡化边界 ——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再出发”刍议 何志明 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理论的三重意涵及其科学化问题 刘雨亭 “时局”历史中的中共早期政治主张 郭若平 农民问题、生产关系论与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脉络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之思想和政治动能 周展安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新探 (1927—1933) 刁含勇 护法军政府治下的广州五四时期学生运动新探 沈志刚 中共在浙江的早期组织与两个国民党省党部之争 (1922—1926) 马楠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关系再认识 ——历史因果、思想逻辑及必然性问题 李晔 中国当代史研究方法论两题 董国强 “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综述 王凇然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双月刊,双月5日出版) 联系电话:(010)83089342(编辑部)(010)83089402(发行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 邮政编码:100017 邮发代号:国内82-864 国外C937BM 每册定价:15.00元 全年90.00元(免邮费) 电子信箱:zszzs@vip.sina.com